

专家学者热议瑞安先贤 探寻瑞安文化发展新道路

思想交流 智慧碰撞

省社科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分论坛活动专家学者发言摘录



记者 陈京子/文 记者 庄颖超 通讯员 李文辉/图

我市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邑,人文荟萃,名家辈出,素有“东南小邹鲁”的美誉。特别是近代涌现出有陈虬、宋恕等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孙诒让、陈黻宸、洪炳文、周予同、缪天瑞等近代新知识的传播者,以及项湘藻、李毓蒙等一批发展工商实业的先进分子。

我市于10月22日、23日举办了以“弘扬瑞安先贤精神 走在改革发展前列”为主题的瑞安先贤与近现代中国——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分论坛活动。众多学者汇集一堂,缅怀瑞安先贤,挖掘、提炼瑞安文化思想精髓,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提升瑞安文化软实力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现摘录本次活动中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

温瑞是浙江现代化启动最早 成效最为明显的地方

丁贤勇(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千年古县瑞安,历史上人才辈出,一脉相承。特别在近代,发现了三杰三孙五黄一大批开时代风气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如重文重商的孙诒让、项湘藻,投身地方文化教育,公益事业,创办通济轮船公司,成为浙南创办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经济社会效益最好的交通运输企业。还有李墨西兄弟,实业救国,创办新式罐头

厂,获南洋劝业会金奖。还有一批出身草根的工商骄子,如李毓蒙、徐漱玉、吴百亨等。这些本土企业的涌现,对温瑞意义远大。1876年开埠之初,福建商人主导温瑞经济,开埠20年后,宁波商人凭借在上海的经济实力,成为主导温瑞的经济力量,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温瑞本土商人开始崛起,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主导温瑞近代经济。温瑞成为浙江现代化启动最早、成效最为明显的地方。温瑞也从“温不出”进而成为“遍天下”,走出温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孙诒让是 思想解放 的先驱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诒让是一位经学家、教育家,也是瑞安、温州地方新式事业的建设者。孙诒让一生成就丰厚,目前却只是被推崇为清末三大经学家,至于他的事功成就,在学术界很少有人议论,而这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不当评价的影响。

梁启超把孙诒让、章太炎、俞樾列为“正统派”,称之为清代汉学的三大殿军,但包含着贬义。事实上,孙诒让等地方人士所从事的新式事

业,一点都不比康、梁的“维新保守、落后”。从办学成就来讲,江、浙地方士绅与外人合作的事业,比康、梁在“百日维新”中匆忙布置的事业更加成功,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1903年孙诒让在温州艺文学堂演讲中对明末清初的“利徐之学”作出正面评价,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进步了如指掌,他肯定“西学”入华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批评中国许多地方风气不开,民情守旧。在士绅反洋教,惹出了“义和拳”的年代中,大多数的读书人仍然对洋人同仇敌忾,孙诒让不怕见外国人,继续真诚地认可“西学”,与洋人并肩合作,让瑞安和温州走上“开放”道路,则是他“思想解放”的标志。

玉海楼是家风传承与乡风培育的重要载体

王兴文(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温州大学孙诒让研究所所长)



孙衣言创建玉海楼的初衷,不只为了藏书之地,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乡梓营造读书研学的风气,培育国家有用之人才。当时瑞安中学师生经常到玉海楼看书,不少温籍学者在年轻时也都受过玉海楼的泽溉。同时,现存玉海楼《晒书目录》和《经微室书目》都专门列有“师友捐赠”一类,多为自撰之作,且多有作者签名,

弥足珍贵。孙氏父子具有远见卓识,利用玉海楼广泛藏书这一优势,使得瑞安地方文化得以代代相传,为促进乡风民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玉海楼是一座文化地标,将19世纪瑞安乃至温州文化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实社会中,如何以玉海楼为中心,重点打造玉海历史文化街区,使其成为以文化展示、文化休闲、文化旅游等为特色的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空间,这是我们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瑞安民众和孙氏后人更有发言权。

瑞安知识群体既讲学术又重事功

徐立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浙江省历史学会秘书长)



众所周知,瑞安历史上涌现全国影响力的学术文化群体,一次就是陈傅良、叶适等人的永嘉学派群体,一次就是晚清孙氏、黄氏以及稍后涌现出的陈虬、陈黻宸、项崇等的维新群体,后者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通过对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重新塑造地方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正是这样的一种

认同和自信,使得一批瑞安人士摆脱了地方文化精英的标签,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人物,影响迄今。

瑞安知识群体既讲学术,又重事功。孙诒让是中国传统经学的最后高峰,又是新式教育和企业的倡导者。陈虬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重要成员,又是中医实践者和维新报刊的创办者,陈黻宸既是晚清史学大家,又是浙江谘议局的议长。瑞安知识群体在学术被时人敬仰的同时,又能走出书斋,这在晚清区域文化群体中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

瑞安学者有紧跟时代的务实精神

汪林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自宋代到晚清温州的学术发展脉络是一条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曲线:呈一个U字型。宋以后清以前,温州及瑞安的思想史、学术史出现了一个断层。U字型的宋代那一头,适合瑞安文化土壤的永嘉学派兴起,使瑞安的学术文化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清代乾隆时期实事求是之学兴起,瑞安的学术文化便开始从低谷回升,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主张实事求是、面向社会实际的改革思潮勃发,在瑞安民间流淌的务实思潮被激活,并被发扬光大。

陈虬、孙诒让、黄绍箕、陈黻宸等人,他们不仅弘扬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学风,而且坚定地认为,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是中国的出路,由此积极投身改革运动。可以说,瑞安在甲午前后的改革运动,无论是从热度还是广度,在当时的浙江应是第一流的,即使放在全国来看,也应属前列。

整个近代,瑞安的学者们从没有以空话应付时代,没有以故作清高的虚伪敷衍社会实际。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根植社会实际,满足国家需要,聆听民众呼声,紧跟时代潮流的务实精神,是瑞安的优秀传统。这个已被历史证明是宝贵的、优秀的精神财富,应该继续传承,进一步弘扬。

以社会科学的史学代替经学 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的逻辑终点

蒋伟胜(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瑞安先贤周予同先生是中国现代经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经学史研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科学精神为指导,遵循经教分离、学中探术、以术言变的逻辑路线展开。首先,周予同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在批判儒教的宗教性过程中,确立经学的学术性意义,指明经学可以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把经学演变史视

作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的互动史,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重大问题都与政治术略有关;再次,把经学看做一个演变的过程,是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在学术上的反映,要求以历史的方法对其展开分期的研究,通过史学的研究让经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获得新的价值与意义。对经学的“超经学的研究”、以社会科学的史学代替经学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的逻辑终点,反映了周予同在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努力保存传统文化、延续民族文脉的价值追求。

开风气之先的近代瑞安人

洪振宁(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温州政协智库专家)



近代中国变法图强的进程中,瑞安人勇当探路者,提倡新学,传播科学,兴办新式学校,发展工商实业,致力于民生改善。孙衣言、黄绍箕等人把变法图强的理念引进瑞安,陈虬、宋恕、孙诒让等人积极参与变法图强。由于知识精英的努力,现代性在瑞安、在温州不断成长,成为了推进早期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动力。他们的学生或同伴又从瑞安的诒善祠塾、利济学堂出发,走进温州、杭州,走向上海、北京,推动知识与制度的艰难转型,形成影响近代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新

的力量。近代史上的温州,现代化的步履艰难而蹒跚,但温州人对变法图强的积极参与,对现代性的追求,对民生改善的探索,却异常的坚定。这种追求,长期坚持下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土壤,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使得温州人的心理更容易适应变革,让文脉在这块土地上得以传承。

近代瑞安知识人那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抱团合作的作风,后来被温州商人继承。那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在温州人身上代代相传。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人继续探路开拓,奋起创业创新,使得温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不断给国人以新的启迪,温州也被人们视为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领跑者。

孙衣言笔谈显露其对国内外巨变有深刻认识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衣言被晚清士人誉为“特立之儒”,其道德学问已成时代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孙衣言作为身处清代嘉道向同光时代转型之中的高级官员,他对中华帝国的危机、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型、西方殖民体制的威逼等均有深刻的认识与深切感触。

孙衣言对来自周边藩属国的贡使和留学生极为关注,与他们热情交往,留下不少唱酬诗文和笔谈手泽。现孙氏家藏文献的《太仆公与安南行人笔谈问答长卷》即是当时会面的珍贵材料,也是孙衣言这份情怀的历史见证,体现了儒家“近者悦,远者来”的理想模式,也展示了传统朝贡体系下国际平等交往关系。但笔谈恰值法国加大对越南的殖民侵略之际,结合这一时代背景,笔谈也隐含了孙衣言一以贯之的对西方强权侵略的批判与抗争。

天涯多芳草 流水有知音

王文韬(温州大学音乐教育研究所所长、音乐学院副院长)



自1997年以来,我和缪天瑞先生书信、电话往来11年。缪先生在他101岁又四个半月的人生路上,有效工作时间近83年。先生称自己的长寿之道是舍得放弃——新中国成立前他放弃了在台湾的舒适生活,携妻女返回大陆,为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竭尽全力;1983年,75岁的缪先生甘愿放弃天津音乐学院

院长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待遇,默默地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一名普通的研究员,立誓编纂系列音乐辞书。切磋现代乐艺,发扬民族精华,是缪先生多次办学经验之总结,直到先生去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在牵挂如何保证家乡的高等音乐教育师资问题,怎样提高音乐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

人生朝露,艺术才是千秋,这是缪先生的人生感悟。先生的杰出,不是浮名、地位,更不是财产,而是人品与贡献。斯人已去近十年,惟其人生足迹中铭刻着的立德树人之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这或许是瑞安纪念缪先生等先贤的目的之所在!

此外,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薛玉琴认为瑞安先贤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与贡献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瑞安先贤不仅积极建馆办学振兴教育,还创办实业发展工商,使瑞安跻身全国新思潮前列,成为全省维新变法重地。对深入研究,她有两点个人看法:一是要把瑞安地方史与中国近代整体历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二是可以采取比较的方法,例如,可以将近代瑞安抑或温州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南通作一

比较,以突显区域特色。来自复旦大学的项宇研究员还就继续探索瑞安新学提出意见,他认为:“复旦大学建立瑞安研究基地,可以帮助整理瑞安地方文献,建设近代瑞安研究数据库,加强上海与瑞安两地的学术交流,复旦教授可以来瑞安讲学,设立研究项目,可从新学在瑞安的传播,新式学校的创办等课题的研究入手,要重视新生研究力量的培育,通过多年的努力,必得更多学术成果。”